

碑帖大家陈锡钧

王巨安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浙江杭州 310007)

Chen Xijun (1880 ~ 1961) dedicated his life to the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 on mental and stone. His collection was abundant and his research on it was deeply. He was possessed of the good reputation, the King of Rubbing. Eventually, he contributed all of his collection. But all of these things about Chen are not known by now.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life of Mr. Chen Xijun and define the feature of his collection and articles.

Key Words :Chen Xijun Rubbing Inscription on mental and stone

内容提要 陈锡钧一生致力于金石文献收藏,极为宏富,复加考订著作,更显功力,有“碑帖大王”之美称与捐赠所藏之丰功,而今却鲜为人知。论文探掘陈锡钧生平经历,考述其藏品与著作。

关键词 陈锡钧 碑帖 金石文献

中图分类号 K877.42

文献标识码 A

金石文献,以拓片形式流传,俗统称碑帖,是各种书体、各名家书法得以保留传播的最重要载体;又因内容丰富,载事确凿,既可补正史之不足,又是地方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标志。但碑帖搜求不易,考订更难,素有“黑老虎”之称,因此自清中期兴盛以来到民国200年间,虽所事者众,但收藏既富复又考订精深者,不过十数人。民国以来,在江南被推为翘首的是定居杭州的江苏淮阴人陈锡钧(1880~1961年),业界冠其为“碑帖大王”,乃实至名归之定评。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生前将所藏宋以来历代碑帖拓本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国家。

一 生平探详

陈锡钧,字伯衡,号汉华,曾用名振之,生于清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1880年6月7日),藏书室名石墨楼,早年曾用室名湖海楼^[1]。关于其生平经历,业界多已不闻,知也语焉不详,迄今权威性的披露仅是1993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为纪念成立40周年而自行编发的《敬老崇文》一书列名介绍,但不过数语,更未涉及1953年陈锡钧担任该馆馆

员后经历。经查,该内容完全来源于1953年的《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调查表》^[2]。而另发现的陈锡钧1951年6月2日亲笔填写的《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登记表》^[3],不仅载明他时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调查组组长,更有他此前长达50余年的所有任职与薪酬记载,远详于《敬老崇文》,且不存在该书所称他在上海、北京曾任推事的经历。该“登记表”从未披露过,有关内容汇录如下:

1899年~1907年任江苏淮扬海道署幕僚。1907年~1910年就读于两江法政学校法律科。1911年~1914年先后在江宁地方审判厅、江北民政总长署、淮安初级审判厅分别担任推事与秘书。1914年赴京应县知事试后,被委任为浙江鄞县(今宁波)地方审判厅书记官长。1915年~1937年,先后任钱塘道尹公署秘书兼科长、杭县(今杭州)鄞县地方审判厅推事、寿昌县知事、杭州市政参议会秘书、嘉兴县、杭县烟酒分局局长、浙江省民政厅秘书、绍兴县、湖州烟酒分局局长。期间,1929年~1939年兼任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化部委员,1934年~1937年兼编《东南

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抗战期间拒受伪职避难上海8年。1946年~1949年专任浙江省通志馆分纂。

从陈锡钧的生平来看,他完全是业余爱好碑帖考藏而成名,其任职多为高薪,为他的收藏带来了一定的经济保证。而任职地在江浙一带,人文积淀深厚,藏家学者众多,方便他丰富收藏学识。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已被同好奉为祭酒,盛名远扬,标志为1936年他被推为浙江文献展览会筹委会金石拓片组主任^[4]。浙江省主办的这次展览会,以其展品丰富且珍稀轰动全国,分有金石拓片等六大门类,所设各主任皆为浙江省内最著名者。1946年他67岁受聘于浙江省通志馆独编《浙江省通志稿·碑碣门》,1950年他71岁被浙江省主席聘职于浙江省文管会,都表明他在碑帖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与影响,浙江长时期无人超越。以此缘故,陈锡钧1953年从浙江省文管会常务委员兼金石组组长任上转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后,于1955年被该馆列为“特出人物”报浙江省委统战部;1957年,他被推为浙江省政协文史组副组长和新成立的考古学会浙江分会理事^[5]。同年,杭州金石书画社成立,社长陈伯衡^[6]。

陈锡钧不会刻印,而以藏考碑帖盛名成为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1951年西泠印社赠交国家,陈锡钧和时任浙江省文管会主任的邵裴之(1884~1968年)同为受托人和经办人^[7]。1957年,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1882~1965年)提议成立恢复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并任主任,陈锡钧被推为第一副主任^[8],另一副主任潘天寿(1886~1971年)与委员沙孟海(1900~1992年)、诸乐三(1902~1984年)、阮性山(1891~1974年)、韩登安(1905~1976年)皆一代名流。近年来,西泠印社极重其社史与早期社员的研究,以陈锡钧在该社之地位,该社挖掘其史料可谓竭尽所能,但生平介绍似未胜于《敬老崇文》多少,也不涉及其藏品与著作去向^[9],以至该社网站“印社名流”栏虽列名介绍陈锡钧,但内容却全引王松泉(1913~2006年)据回忆撰成的《民国杭州藏书家》之“陈锡钧一节”^[10],而不辨其细节是否有误。该节不过数百字,同样未能展现陈锡钧全貌。这都说明社会对于陈锡钧的研究是不够的。

陈锡钧擅魏隶二体。著名美术教育家姜丹书(1885~1962年)曾总评其“精碑版学,收藏甚富。

最善书曹全碑,凝链藏峰,沉著稳秀”^[11]。杭州西湖苏堤有六桥,其中跨虹、东浦、压堤三桥名为陈锡钧所题,现仍存见。他年届五旬才得子,有三子一女。无弟子。1961年11月16日,陈锡钧因病逝于杭州^[12],享年82岁。

二 藏品考述

碑帖收藏与考证,贯穿了陈锡钧一生,是他人生的主要内容。

陈锡钧三代收藏,他少年时已开始从事碑帖收藏考证,并一直持续到去世前,长达60余年。他对金石文献的搜寻,完全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其友余绍宋(1883~1949年)曾以“嗜古成癖”^[13]形容之。如《桐庐县桐君山唐独孤勉等题名摩崖》,向未见史书记载与拓本流传,因该地极险,无法摹拓,陈锡钧“百计求之不可得”^[14],一直耿耿于怀,最后竟求助当地县长兴师动众冒险而拓得。他的收藏经历,其藏品题记多有反映。

珍稀碑帖求之不易,向来索价甚高。陈锡钧毕竟不是高官富豪,养家之余,他要藉薪广作收藏,必然不易,花费精力心血更多,也使他更珍爱其藏品。陈锡钧三子陈龙章这样回忆其父亲:“他一生视家藏文物为生命……即使在抗战时期,家境困顿之极,他宁可终日辛劳,以卖字以及任家庭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一家老小勉强度日,而绝不肯变卖哪怕是一件文物以资家用”^[15]。解放后,他经济状况仍然不好,自称“收不敷支”、“力求节约”^[16]。

早在抗战前,《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已展示了陈锡钧所藏的珍贵。该刊1934年~1937年共出版87期,所载金石拓片以陈锡钧藏品为最多,达48种,如果包括连载,几乎每一期都见他的藏品,无一不是孤本名拓罕见之本,如宋拓《汉西陲颂》、《魏曹望繇造像》、《汉阳三老食堂题记》、《汉马姜墓志》、《汉开通水道记》等等。可惜抗战爆发,该刊停办,陈锡钧藏品无法更多展现于世,他也于1938年初举家避难上海,但藏品无法全部带走,因此损失颇多。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往岁日寇侵华,我的原籍淮阴、寄籍杭县两处所藏累世流传的文物,均被洗刮一空”^[17]。为志不忘,他嘱托了“石墨楼丁丑劫遗”印,却没有留下相关记录。而《淮阴陈氏世藏金石善本全部目录》6册(浙江图书馆藏),系陈锡钧于1956年请人编成,不能反映他以往的拥有。

就是这样一位收藏家,最后将所藏大量碑帖

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国家。

1960年5月,陈锡钧已将装裱过的碑帖41种46轴捐赠给浙江省文史研究馆^[18]。而大规模的捐赠是第二次,浙江图书馆于“1961年1月,接受金石家陈锡钧捐赠拓片1万余件”^[19]。附赠的还有陈锡钧的几部手稿。数十年后据陈锡钧挚友王松泉回忆,此次捐赠,陈锡钧倾其所藏碑帖,达26大箱,事前曾相商于王松泉。王松泉提议由浙江图书馆保存为宜,并代为出面联系^[20]。浙江图书馆获知陈锡钧的这一意愿后,报告给浙江省文化局,该局因这批碑帖属于文物,故按当时的规定,请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先予点收,并报告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要求授其奖状和奖金3000元^[21]。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批复同意,并以本委名义发给奖状^[22]。但陈锡钧最终不接受奖金,只要求将他在安徽当医生的长子调回杭州,有关部门照准。

碑帖是陈锡钧的主要收藏,却不是他的收藏全部。1965年1月~7月,其夫人继其遗志,又分别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字画、器物等文物共计170件,捐赠给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字画文物及陈锡钧个人用品计545件。经过这4次捐赠,陈家“剩余之金石(学)善本书及古代和现代名人书画册页、砚台图章、玉器瓷器尚很多,惜在‘文革’时被抄达六次之多,所有文物均被抄殆尽……叹几代收藏,从此家中一无旧物矣!”^[23]

笔者曾整理过陈锡钧所赠碑帖,其特色如下:

(1)多孤本名拓。以清拓本为主,也有大量的明拓本和民初拓本,另有宋拓本数种,概多陈锡钧亲笔考证题识,常见印有“石墨楼”、“伯衡审定”、“陈锡钧”等。2006年5月,碑帖权威、故宫博物院施安昌研究员为浙江图书馆部分善本碑帖作鉴定,对陈锡钧所藏与题识甚为肯定,认为如宋拓《黄庭经》等可定为一级文物。

(2)注重文献史料价值。举凡历代碑碣、墓志、摩崖、砖刻、金石器物拓本等都有收藏,尤重不见记载之物,对此《金石书画》特刊所载已有充分体现。所藏多系未裱不经剪贴之散张,置于印有“淮阴陈伯衡考藏金石拓片”及品名、时代等内容的专用牛皮纸袋内,因保存了石刻或器物的形貌,现在看来尤显珍贵。

(3)所藏浙江金石文献非常丰富,有的甚为罕见。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浙江图书馆经过对陈

锡钧所赠的部分整理并以此为主体,编印出《馆藏浙江金石拓片目录》“初编”、“二编”各1册,第三编不及成书而停顿。

浙江图书馆所藏碑帖能在省级公共图书馆中名列前茅,主要来源就是陈锡钧的这一捐赠。关于其数量,《浙江图书馆志》所载1万余件,而浙江省文化局请示报告为5415件。经考,这一差异主要是碑帖计数“种”与“件”常被相混甚至不分所致。如《杭州石屋洞造像题名》,有58种,但著录为《杭州石屋洞造像题名五十八种》,则被当作一种记。《淮阴陈氏世藏金石善本全部目录》所载也是如此。

三 著作提要

陈锡钧一生笔耕不辍,即使在去世前几年仍时时记录研究心得,勤加著述。除在藏品上作大量考证性题记外,他还有7部金石学著作,概未刊行。内容与存世情况考述如下:

(1)《两浙碑碣志》,又名《浙江省通志稿·碑碣门》,不分卷,十六册,陈锡钧手稿本,自题“编纂”,60万字左右。此为陈锡钧任浙江省通志馆分纂时所作的呈交稿,系《重修浙江通志稿》之一章,随浙江省通志馆档案于解放初一并移交给浙江图书馆保存至今。该稿陈锡钧作“序例”称收三代至清末浙江石刻,但所见录到元代,当时因浙江省通志馆1949年3月解散而未竟事。此乃陈锡钧倾力之作,达24条1600字的“序例”详列收录范围与体裁。其主要特点一是广闻博采,不仅广录前贤专著,更多取材于历代通志、各地府县志、专志以及不见著录之历代拓本;二是对每目作提要,简介其源流,或录他人已有之考订,因此可谓集浙江元以前碑刻之大成,内容远超前人。1983年,浙江图书馆曾以光电法刷印了《重修浙江通志稿》,但未收入此章。

(2)《历代篆书石刻目录》一卷,一册,陈锡钧手稿本,自题“集录”,数万字,浙江图书馆藏。此稿录先秦至明代篆书石刻283种,并简作提要。其大部分内容曾在《金石书画》特刊第46~86期(1935年12月15日~1937年7月31日)连载,惜抗战事起停刊而未完。此系增补稿,卷端钤“伯衡八十岁后所作”,可见成于1959年后。附有金石大家顾燮光(1875~1949年)序与陈锡钧自序。

(3)《石墨楼金石见闻录》,八册,另附未录全的目录一册,陈锡钧手稿本,自题“编”,约二三十万字,浙江图书馆藏。该稿未全标卷数,陈锡钧在

首册中夹条记为八册,而在1957年他自填的《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登记表》^[24]中又称十二册,且各册删改程度大异,用纸不一,故笔者疑这八册是定稿本和初稿本的相混。此稿详考先秦以来千种以上金石碑刻,极具史料价值。该稿原题《石墨楼金石述闻》,简称《金石述闻》,1953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调查表》将《石墨楼金石见闻录》和《金石述闻》误作二书同录,一路影响了《敬老崇文》直至西泠印社的一些论述^[25]。

(4)《校碑随笔校注》。《校碑随笔》为著名金石书画家方若(1869~1955年)考证碑刻的最主要著作。陈锡钧直接在该书两个版本上作校注,并各题该名于卷端:一为民国初上海朝记书庄石印本,四册;二为民国期间西泠印社排印的《山阴遯庵金石丛书》本,六册。前者为朱墨校注,量也多于后者,达数百处,但概多数百字长注。此二版本校注稿不见任何原始记载,现为浙江图书馆藏。

(5)《翁松禅金石学》,一册,陈锡钧手稿本,自题“辑注”。据西泠印社社员朱妙根、黄镇中撰文^[26]披露,此系其友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杭州古旧书店购藏至今。翁松禅即翁同龢(1830~1904年),其对古金石刻考订功力之深,主要体现于《翁同龢日记》四十巨册。该日记于抗战期间石印出版,陈锡钧避难上海时“节衣缩食,勉力购置一部”;“择至精者提要,抄成小册子”^[27],并在此辑本上加有“不下三百多处的题记、考证”^[28]。

(6)《叶鞠裳金石学》,陈锡钧在1957年的《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登记表》中称有四册。叶鞠裳即叶昌炽(1849~1917年),室名缘督庐,有《缘督庐日记》四十三册载其治学经验及对金石书画古籍等考证。陈锡钧此作之体裁,当与前者相似。现下落不明。

(7)《枫树山房帖目补编》,陈锡钧在1957年的《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登记表》中也称有四册。枫树山房为清惠兆壬室名,惠兆壬工书精鉴别,有《枫树山房汇刻帖目》三卷,未刊行。陈锡钧作“补编”,当是补其不足。现也下落不明。

陈锡钧能广泛发现、考证、补充翁同龢、叶昌炽、方若这些金石学巨擘之阙漏或不足,体现出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深邃功力,并大大丰富了金石学。而《两浙碑碣志》对于了解掌握浙江元代以前石刻分布及其存世状况,作用极大。

[1]陈锡钧《湖海楼杂抄》钤“湖海楼”印,陈锡钧校注上海朝记书庄石印本,《校碑随笔》钤“淮阴陈氏湖海楼藏书印”。均浙江图书馆藏。

[2]该表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藏,不署年份,内填陈锡钧74岁,当为1953年浙江省政府聘陈锡钧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时所作调查。

[3][16]陈锡钧1951年填《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登记表》,浙江省人民政府制发。浙江省委统战部藏,无档案号。

[4]浙江省立图书馆《浙江文献展览会报告》1936年3月。

[5]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藏并题为“陈锡钧”的事记材料,无档案号。

[6]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文化艺术篇》,中华书局1999年,第256页。

[7][8]王佩智《西泠印社旧事拾遗》(1949~1962年),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第24、134页。

[9][25]陈振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

[10]政协杭州市文史委员会《杭州旧事——杭州文史资料》第25辑,2001年,第43~44页。

[11]姜丹书《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3~354页。

[12][15]陈锡钧三子陈龙章2006年11月1日致笔者函。

[13][14]余绍宋《桐君山题名摩崖跋》《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1936年第62期,第2页。

[17][27]陈锡钧《翁松禅金石学序》,书影附于朱妙根、黄镇中《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陈伯衡与他的碑版金石考证》文后,载《西泠印社·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第183~185页。

[18]1960年5月12日《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收(60)字第17号图书收据》及《馆员陈锡钧先生赠金石拓本清单》,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藏。

[19]浙江图书馆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图书馆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5页。

[20]王松泉系家父,生前告知笔者。王松泉《民国杭州藏书家·陈锡钧》。但该处所忆陈锡钧卒年等细节有误,第10页。

[21]1960年12月26日《浙江省文化局关于给陈锡钧老先生以奖状、奖金的请示报告》(文办<60>字第328号),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12-144。

[22]浙江省人民委员会1961年1月9日办字1号批复,浙江省委统战部藏,无档案号。

[23]王松泉《民国杭州藏书家·陈锡钧》,第10页。

[24]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藏,无档案号。

[26][28]朱妙根、黄镇中《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陈伯衡与他的碑版金石考证》,第14页。